

ZHONG GUO SHI CHANG JING JI SHI JIAN TAN SUO

经济腾飞启示录—— 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探索

劳白 周景勤 温小郑 主编



前 言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改革与发展的奇迹。一般地说,经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会引起经济秩序的紊乱,这是改革所应付出的成本。一些国家的改革实践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看,不仅没有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而且还保持了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推进了经济腾飞的进程。应当说,这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之所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启示也正在这里。

中国经济的腾飞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循着一个特定轨迹发展的。中国经济腾飞的特殊环境,表现为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否定与对新经济模式的构建这样一个过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破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在保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给整个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

鄂新登字 01 号

经济腾飞启示录

——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探索

◎劳白 周景勤 温小郑 主编

出 版 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邮政编码 430022

发行科电话 (027)5829493

责任编辑 程世德

印 刷 者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发 行 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张 1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 5

印 数 1—5 000 册

字数 247 千字

ISBN7-216-01490-1/F·229

定价: 9.90 元

本书如因印制质量不合格,由印刷厂调换

饭的分配体制。通过一部分地区 and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打破了封闭、半封闭的经济模式,日益加强和扩大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和交流,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经济腾飞的特殊轨迹,就是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通过改革我们已经打破了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市场调节比重日益扩大,在部分地区和产业领域已占据优势,市场机制逐步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步入新的轨道。虽然这一轨道还在铺设中,但它所通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中国经济腾飞源于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经济腾飞最深刻的启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体说来是沿着两条线从外围向中心展开的。一是地域线,从沿海向内陆推进,以广东、福建开创特区,开放沿海城市起步,逐步推向沿边、沿江,直到内陆地区的中心城市及腹地,目前正向中心地带进军;一是体制线,从计划体制的外围开始突破,逐步向中心推进。以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城市开放个体、私营的禁区,以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等形式,松动和淡化原有的计划体制,然后逐步向体制的中心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革发展。这一被喻为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探寻中国经济腾飞

的道路,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如果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上篇的目的的话,那么,总结过去启示未来,这应当成为下篇的目的,我相信中国经济腾飞启示录会达此目的。

目 录

一、“三沿”战略

——经济超常发展的战略 (1)

二、特区效应

——我国经济特区的兴办与发展 (31)

三、“龙头”效应

——城市的中心作用 (52)

四、异军突起

——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73)

五、制度创新

——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 (94)

六、首钢模式

——两种体制观的冲突 (114)

七、股份制

——人人都可以做一个“资本家”的梦	(135)
-------------------------	-------

八、第三产业

——国民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	(157)
---------------------	-------

九、“衣服的第一只纽扣”

——价格面面观	(180)
---------------	-------

十、信 息

——一种神奇的力量	(197)
-----------------	-------

十一、证券市场

——泡沫经济的源头	(213)
-----------------	-------

十二、期货市场

——一个正在发育的市场体系	(232)
---------------------	-------

十三、劳动力市场

——最富生机与活力的生产要素市场	(256)
------------------------	-------

十四、房地产市场

——充满诱惑的领域	(271)
-----------------	-------

十五、机遇与挑战

——复关与我国改革开放	(295)
-------------------	-------

一、“三沿”战略

——经济超常发展的战略

经济处于不发达的地区,如不采取超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势必永远落后。许多国家和地区正是采取了超常发展战略而使经济迅速发展。沿海、沿江、沿边发展的开发开放模式,正是适应我国超常经济战略的最佳模式。沿海、沿江、沿边地区的高边际产出正是以前经济发展中的盲点;今日,却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从而为世人所注目。

改革开放十五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提前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人民生活得以显著改善;经济结构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轻重工业比例进行了重大调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所有制结构呈现多样化,出口创汇能力加强。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创造了社会主义改革与经济腾飞的一系列发展模式。在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已从改革之初的计划经济“均衡发展”模式到“计划+市场”体制下的“梯度推进”模式,直至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沿海、沿江(线)、沿边发展的开发开放模式。由之而带来的宏观经济效益及发展态势,必将为下一步

改革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因素,日渐成为发展的阻力。因而,总结宏观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无疑会利于今后的改革与发展。

走出“均衡”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都把“均衡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则,具体表现在:

“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年),面对旧中国生产力布局偏集于东南一隅及畸形的区域经济结构的总格局,政府就把合理地布局工业体系,以提高全国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并有利于巩固国防纳入了国家宏观经济计划之中,在沿海地区,重点建设(改扩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在内地重点进行了以武钢为中心的华中工业基地和以包钢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基地建设;同时,在大西北、大西南也开始了部分工业建设。这五年内动工兴建的694个大型工业项目中,472个(占66%)摆在内地,222个(占34%)建在沿海地区。基建总投资中,沿海与内地分别占46.7%和53.3%。

“二五”计划时期(1958~1962年),原定部署是:继续加强东北工业基地;充分利用、适当加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城市的工业;内地除继续进行武钢、包钢等新基地的建设外,还同时积极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地区以钢铁、有色金属及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基地建设;继续建设新疆地区的石油、有色金属工业;加强西藏的地质工作。后因“大跃进”干扰,使得工业布局上呈现出“遍地开花而不结果”的格局。

“三五”和“四五”计划期间(1966~1970和1971~1975年),主要突出以备战为中心,进行大三线建设,其中,“三五”时期,内地建设投资约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66.8%,其中大三线地区(重点

在西南地区)的投资达 482 亿元,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 52.7%。此外,还兴建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黔西的六盘水煤炭基地、黔中铝基地、德阳——绵阳机械工业基地等,同时,在西北进行了酒泉钢铁厂、西北铜加工厂和关中、汉中、天水、银川、西宁等地机械工业基地建设。“四五”期间,除继续西南、西北建设外,还在豫西、鄂西、湘西及晋南又开辟了一系列新基地。这一时期,内地与三线投资比例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 53.3%和 41.4%。当时还从备战出发,组成了 10 个大经济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建成能够“各自为战”的经济体系,并在各省区进行“自成体系”的小三线建设。

“五五”计划时期(1976~1980 年),投资地区重点东移。1978 年和国外签订的 22 个大型引进项目中,有 9 个摆在东部地区。经过“十年动乱”后,宏观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如许多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区能源严重紧缺,老矿区、油田采掘失调,技术老化,当时并未集中力量先解决这些急迫问题,却又忙着铺了一批新摊子。1979 年 4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得工业布局从现有资源配置及使用方向上加以调整,宏观经济发展格局及效益均有所改善。

统观“一五”到“五五”计划时期的国家宏观经济计划(战略),我们不难发现,“均衡”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生产建设,始终成为其核心内容。一般而言,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均衡是几乎不存在的。诚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努力方向和发展目标之一,是要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经济生产能力的全国“地域均衡化”。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区自然禀赋差异大的国家中,即便是要实现相对均衡发展,也是必须要经历若干代人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实现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凌驾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发展水平与状况而去实现所谓的“均衡化发展”,必将会带来沉重的社会经济代价。从我国 1978 年以前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计划实践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急于求成地进行“均衡化发展”所带来的除一定的工业及国民经济发展外,所付出的却是更为惨重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长期不高等代价。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学术界对沿海与内地问题、“三线”问题、均衡发展问题等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其自然地理环境、技术经济条件、资源及要素禀赋的区际差异极大。这种差异性既存在于东西部的沿海与内地之间,又存在于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之间,这是进行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必须首先要考虑和面对的客观现实。在当时我国建设基金紧张的条件下,是选择高度经济增长和宏观投资效益的最优化,而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在具备经济迅速发展自立条件的少数地区重点开发呢?还是忽视这种客观上存在的区际差异,而采取“撒胡椒面”式的“均衡发展”投资模式呢?显然,后者是以牺牲宏观经济效益为代价而换取全面均衡发展格局的。因而,不可取。在改革开放以前,传统的计划体制一统经济领域,国家从全局利益出发,有计划地促成了全国性质的“相对均衡发展”态势。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基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国际大环境而致,虽未实现经济的高效益发展,但毕竟也给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宏观经济成效,为今后的发展创设了前提。

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国际大环境日趋良性化发展,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并随之作出了相应的调整。首先,认识到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在生产水平力的不同发展阶段,重点发展与不平衡发展是实现最终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生产水平普遍不高、经济效益低下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每一时期实施有重点与不平衡发展那些能最有效推动宏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产业和地区才是恰当的战略选择。其次,均衡布局与发展也不是通过“抑高拔低”实现的,而必须以提高已有的经济重心区作为向新的经济发

展区展开的前提与依托,始终要把提高原有经济区和开发新地区有机结合起来。再次,新的经济开发区建设,也应在总体上保持循序渐进方式来逐步推进,盲目采取“跳跃式”发展战略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效益损失。第四,是建立“大而全”式的独立经济体系,还是广泛开展区际分工协作,构建各具特色的、互相耦合与促进发展的区域经济结构体系?显然,从我国的实践可以看出,前者所带来的无益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事实上,这也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地域分工原理的。为此,我们应提倡,冲破自然经济传统的束缚,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劳动地域分工,发展多区域之间的贸易,形成各具特色、相互耦合、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结构体系,无疑会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促使进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最后,在经济发展布点上,是“遍地开花”,还是“点—轴”模式发展?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区域的开发,总是最先从一些基点开始的,不同的基点之间延伸成轴线,由这些点轴而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发展力场空间,对周围地区产生极化和扩散效应,进而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因而,选择能够最大程度带来宏观经济及社会效益的点轴体系,就成为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

基于上述,以及已经缓和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格局,我国首先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型经济体制,将工作的重心向经济建设方向上转移,依据当时我国的科技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将全国按地域划分为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发展地区(或次发达地区)及西部欠发达地区三大块,并据此从宏观上进行了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形成了当时在宏观上的确具有指导意义的宏观经济“梯度推进战略”。其具体表现在“六五”和“七五”计划时期,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经济优势,扩大其对外开放,促使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外向型经济,吸纳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在消化吸收的前提下,向内陆广大腹地扩散辐射,以促进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还有步

骤地开发中、西部的丰富资源,以支援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同时,还积极地推进东、中、西部之间的横向经济技术联合,努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今后的经济效益准备后劲。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成熟化,我国地域空间的对外开放格局也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也渐由计划型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走向了“计划+市场”的双重作用机制。这些都为宏观经济的“东、中、西部梯度推进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沃土”条件。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环境条件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发展现状,才产生了当时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战略理论。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经济一体化、网络化,已经出现了良好发展势头,传统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城乡隔绝的老格局已经开始被打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也迅猛发展,宏观经济效益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经济目标达到了预期值。

总之,从单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均衡发展”模式,到“计划+市场”的双轨体制下的“梯度推进”模式,实践充分证明了,后者对于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效益的优越性,它是对传统“均衡发展观”的科学扬弃,带着黎明的曙光,走出了“均衡”的误区。

走向“三沿”战略

“六五”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调动了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增强了区域经济的活力,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使地区经济呈现出日趋活跃的态势。另一方面,又由于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措施的体系不健全,而诱发了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

1. 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急剧拉大,在“六五”计划基础上,“七五”计划进一步实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梯度推移战略”,

国家优先将投资向沿海地区倾斜,以企望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内陆腹地腾出原料和市场,并通过存在于三大地带之间的“梯度差”把资金和技术向西推移,以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与振兴。然而,实践证明,沿梯度向内扩散效应并未尽人意,反而进一步增大了回流效应。国家所采取的梯度开放政策,极大地增强了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力,直接刺激了沿海一些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财政“分灶”政策的实施,地方财政自主权扩大化,外资流入,进口物资向内地转口贸易,以及在税收及外汇留成等方面所给予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优惠,都使这些地区直接或间接受益。尤其是在实行了商品经济体制后,使享受特殊优惠的沿海地区并非从无情的商品竞争市场中退出,使得东、中、西三大地带处于一个极不公平的外部环境中,人为地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投资向东部沿海地区过度倾斜,也严重影响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1981~1988年,内地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46.4%降为41%,而同时期江苏、山东、广东三省这一比重却增加了6.5个百分点。此外,长期以来,价格体系的不合理也诱致了中、西部经济的增长缓慢。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以计划价格向东部地区转移输出能源、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大量价值因价格不合理而转移向东部,另一方面,东部又以市场高价返回给中、西部地区制成品。这样,东部地区就在双重价格机制下获取了两次附加利润,拉大了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2. 区域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化。改革以来,国家把很大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和企业,从而形成社会财富高度分散的格局,中央可资支配资金在社会总资金中的份额下降,国家配置生产能力的下降。例如在1988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64%,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47.2%,这两个数值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水平。同时,国家直接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也由改革开放前的76%下降为25%左右,这无疑会导

致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其次,“财政分灶”使各区域地方政府增强了财政收入的动力。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因而争相投资于见效快收益高的加工项目,区域之间争相进行原料抢购,封锁区域市场,以防“肥水”外流,封关设卡保护区内市场。这样,诱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趋同化,从根本上背离了宏观经济“梯度推移战略”指导思想。在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上,表现为: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并未相应同步升级,并非要求转移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也发展缓慢。伴随着沿海新开发区与区域经济国际化的诱惑,使中、西部的人才、资金进一步流失,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3. 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增长不景气。国家投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使得面对竞争剧烈的商品市场,内地许多老工业基地增长缺乏活力,经济不景气。主要原因在于投资不足,使其技术更新改造与产业结构升级都走入了困境,已造成了这些地区资源枯竭、运力紧张、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成为今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制肘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引入和“梯度推进战略”的实施而出现的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区际间原料大战及市场封锁等问题,妨碍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潜在效应的充分发挥,也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合理化分工,实现优势互补与协调发展。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引入,相反,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运作,才使得出现了跨区域的技术经济协作,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中的不合理配置。当然,在新旧体制交替阶段,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同时起作用,市场发育不全,程度不高,价格体系不合理,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调控手段尚不完备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上述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

首先,“梯度推移战略”较少考虑区域利益自主权的发挥,片面

地强调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运作机制上,由于在短期内不可能形成经济增长的区域间高效传递机制,而且发展上很大程度也受制于区域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在日趋市场化的经济发展体制下,更是表现出了这种态势。因而,在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上,要在保证总体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合理兼顾区域利益自主权的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化发展。其次,“梯度推移发展战略”只是基于全国大块地域范围的综合性总体差异性而作出的决策,对于各个地域块内部的差异性未作充分考虑;因而,在宏观经济发展指导上难免有失偏颇。8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之间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确定呈现出“梯度差”。但是,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每个内部,也并不是一个均质发展的整体,而且,同一地带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还大于同其他地带之间的差异性,尤其表现在,三个地带内部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本质差别仍然大于三大地带之间双重结构的程度差别。因而,按照更宏观的“梯度推移理论”去指导经济发展,必定会漠视上述种种内在实质差异性,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以,今后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要在保持宏观经济格局优化前提下,也应充分兼顾区域经济差异性,实现区域政策的合理化,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耦合共进。再次,“梯度推移发展战略”是在改革开放前提下的产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轨制运行,使得该战略发挥了较大程度的指导作用。事实上,该战略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的计划性机制,目的是来引导市场,引导区域发展方向。在执行的后期,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化,日益暴露出了该战略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上的弊端,不利于宏观生产力合理布局,不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第四,在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日趋缓和的情况下,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经济发展逐渐地走向世界化趋势。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逐渐地走向区域集团化,这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域经济集团内部各组无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各地域内在上具有较强的经济(如资源)互补性。如此使它们能够相互依存,产生共同的经济利益,从而促使它们走向联合,形成某种区域性经济组织。因而,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应顺应这种趋势。它们经济的外向程度可以因本身的发展状况而有所差异,但不应存在本质的不平等性差异。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区域经济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都可以面向世界市场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只要具备一定的比较利益即可。在交通运输条件发达的现代社会,尤其不能以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作为判定是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标准(但我们也从不否认沿海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便利性)。因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应是全方位的。况且,作为一个大陆国家,我国的对外联系不仅可以在沿海地区有效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更长的陆地边境线展开。从长远看,中部及西部地带也可以通过发达的“大陆桥”与国外进行海上交往,东部地带也可以经过“大陆桥”与内陆国经济往来。这样,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梯度差别会逐渐减小。这也就否定了“梯度推移发展战略”对内陆地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制约。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要求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以及其内部各区域公平地参与市场构建,实行公平竞争。宏观经济政策只在市场上直接或间接地起作用,通过市场机制要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达成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分工、相互耦合、相互促进,实现高速、稳定、协调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

鉴于上述,迫切需要一种更能科学合理指导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这种战略指导思想必须能够既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情况,又具有较高的理论前提。只有集成这两个根本基础条件,才能真正地从宏观上诱使国民经济沿着持续、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

首先,让我们概观一下国际国内情况。进入 90 年代后,国际政